

# 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北京墓地考略(下)

王和平

154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欧洲成立后,葡萄牙最先获得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教权。凡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皆要服从于葡国并从葡国搭乘船只前往。法王路易十四亲政后改变了这种状况。1685年3月由法王派遣的以洪若翰为首的“法兰西中国传道团”一行6人从法国出发,取道暹罗,除1人被留在暹罗外,其余5人1688年到达北京。自此,法国耶稣会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传教力量出现在中国,而不再依附于葡国。并很快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和信任,没过多久便获准建立了属于法国耶稣会士的教堂。在和葡系耶稣会不和的情况下,他们希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墓地。这个愿望在1732年得以实现,这就是正福寺墓地,此时距栅栏墓地的建立已122年。由于正福寺墓地破坏严重、国内原始资料缺乏等原因,其历史变迁的脉络不似栅栏墓地那样清晰。现笔者就目前所知对正福寺墓地做一粗略考证。

## 正福寺墓地

正福寺墓地,又称北堂墓地或法国人墓地,位于京西海淀区四季青乡彰化村,原址是明朝大将军徐达之后的家祠,到了清代,因多年无人管理,已残破不堪。墓地东西窄,南北长,占地面积约30市亩。1775年,耶稣会尊教皇令在中国被迫解散。1785年,按照罗马传信部部谕,遣使会接管了法国耶稣会传教事物,北京各堂宅院、莹地田园及一切传教诸业始由遣使会负责。1812年主持法国传教事物的冀若望神父去世,有关法国传教诸事最终转由当时负责北京传教事物的葡国遣使会士毕学源主教署理。

至于墓地的名称,应是沿用原来该地区的名称,只是原来此地叫做“正佛寺”,而非“正福寺”,直到1840年,此地仍然叫做正佛寺。或许“佛”字与天主教的信仰有悖,因此更名作“正福寺”,以象征传播上帝福音。1860年恭亲王发给法国主教孟振生的墓地管理执照中已被称为正福寺。以此看来,更名应发生在1840年至1860年之间。

对于墓地的来源,以前多做皇帝赐地解,这也许是受了栅栏墓地和西堂墓地皆是受赐于皇帝的影响。自天主教传教士东来,尤其是有清以来,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及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便是传教士和中国帝王之间互为取舍的目的和手段。传教士以传授科学文化为手段,以扩大天主教影响为目的。中国帝王则相反,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天主教为手段,以学习西方科技为目的。而找到中间的平衡点便是双方互惠的关键。这个平衡点便是所谓的“利玛窦规矩”。然而这种平衡在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1706年开始的“礼仪之争”中被打破。中国从此开始实行禁教政策。但为了上面提到的目的,康熙皇帝对传教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不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下了逐客令。而对尊重中国风俗,继续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实行了“领票制”,对申明“永不回复西洋”者,发给票证,允其在中国居住,自由传教。现存康熙朝档案中记:“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若教化王再怪你们遵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叫你们回西洋去……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

打发回去。”<sup>①</sup>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康熙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怜惜之情。他所实行的领票制，其性质可以说如同今天的加入中国国籍。因此，以康熙对传教士所持的宽容，赏赐传教士墓地自是完全可能的事。至雍正初年，雍正帝对传教士的态度也是友好的，后因一名传教士参与了亲王谋反的事件而对天主教采取了严禁的政策，“除通晓技艺，愿赴京效力者送京外，其余均送澳门安置”<sup>②</sup>，领票者亦一并遣归。即便如此，雍正帝对供职宫中的传教士仍然另眼看待，优渥有加。根据有关史料统计，在雍正年间去世的5位传教士中，获得皇帝赐银助葬便有4位。1732年还赐银给传教士以修缮他们在地震中受损的教堂。这样看来，雍正帝赐给在宫中效力的传教士一方墓地也是合乎情理的。

然而，要肯定正福寺墓地的建立是源于皇帝的赐予则仍感证据不足。首先是墓地入口处的门额上没有“钦赐”的字样。樊国梁在《燕京开教略》一书中谈到栅栏墓地和西堂墓地时，皆着重提到墓地门额上的“钦赐”匾额，若正福寺墓地也是受赐于皇帝的話，墓地的门额上也应有“钦赐”匾额，而若果真有匾的话，想来樊国梁对如此荣耀的事是不会遗漏不记的。再者，耶稣会士逗留中国期间，与欧洲有着大量的书信往来，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也不乏传教士去世送葬等内容，但尚未发现有關於正福寺墓地是皇帝所赐的文字。还有，在20世纪初期，有一位法国人曾在此墓地中发现一块用拉丁文刻写的石碑，内容涉及墓地的建立与重修。笔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了这方拉丁文碑的原拓。这帧拓片横约115厘米，纵约30厘米，碑文每行字体大小略有不同，现抄录如下：

HOC FIDEI CHRISTI MONUMENTUM  
A PREDECESSORIBUS SUIS ANNO 1732 ERECTUM  
P. P. GALLIS. J. EX INTEGRO RESTAURARUIVT ANNO 1777  
IMPIA MANO DE STRULTOM ALUNNI CONGR. MISS DENUO EXINUXENUNT  
ANNO 1863

从碑文中可看出，此碑为1863年承修正福寺墓地的遣使会（即圣味增爵会）所立，但却没有注明墓地为皇帝所赐，只简单说明墓地为耶稣会士在1732年所建。其后记录的是1777年及1863年两次对基地进行全面修复的时间。按照常理，立碑者是不会漏掉“御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基于以上几点原因推断，该墓地更大的可能是传教士在当年自行购置的。雍正初年，在康熙朝获罪的意大利籍传教士德里格出狱后，亦曾用私人储蓄在西直门购地建堂筑屋，且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干预。很多教内人士在禁教期间仍可自由出入。以此分析，法国传教士为自己购置一块墓地应是不难办到的。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该处墓地是不是法国传教士自行购置的，当朝皇帝以及后来历朝皇帝都认可了这块墓地，即把它看作是一处“西洋人坟地”。

1732年正福寺墓地建立后，最先葬入此处的是1687年首批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之一，著名的张诚神父，他曾为康熙朝《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及《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作出过极大的贡献。1707年张诚在北京去世后，先葬在位于二里沟的栅栏墓地，因当时尚未建立属于法国传教士的独立墓地，后于1735年迁葬于正福寺。与张诚神父同时来华的另一位著名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去世于1730年，应该也是在正福寺墓地建成后移葬此处的。由于法国传教士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有过突出的贡献。为了彰表和感谢这些勤勉睿智的传教士，他们在死后多得到皇帝的关照，不但赐银助葬，有的还遣官送葬。如1741年病故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皇上除赐葬银200两、大缎10匹外，另“派御弟某亲王送葬，其他亲王贝勒十人亦皆各遣属员送葬”<sup>③</sup>。法文版《北京教会史》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在正福寺墓地为其举行葬礼的情形<sup>④</sup>。在中

国去世并葬于此地的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冯秉正、安泰、沙如玉、杨自新、汤执中、纪文、蒋友仁、汪达洪等，皆先后得到过皇帝赐银助葬的赏赐。1777年，共葬有耶稣会士23人，其中法国19人，中国4人。1835年，共有墓46座，其中有传教士39人，包括耶稣会士32人（法国25人，中国7人），遣使会士（圣味增爵会士）2人（法国1人，爱尔兰1人），其他传教会4人。至1896年，从墓地平面图上可看出共有碑68方（见插图1），其中，耶稣会士占32人（法国25人，中国7人），圣味增爵会士23人（法国15人，中国7人，爱尔兰1人），其他传教会3人。没有碑文的墓碑有8方。另外，还有法国阵亡官兵纪念碑一座，法国军官墓碑一方。正福寺基地的再次大修是在1900年以后。由于基地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了彻底的破坏，1903年遣使会对毁坏的房屋和教堂予以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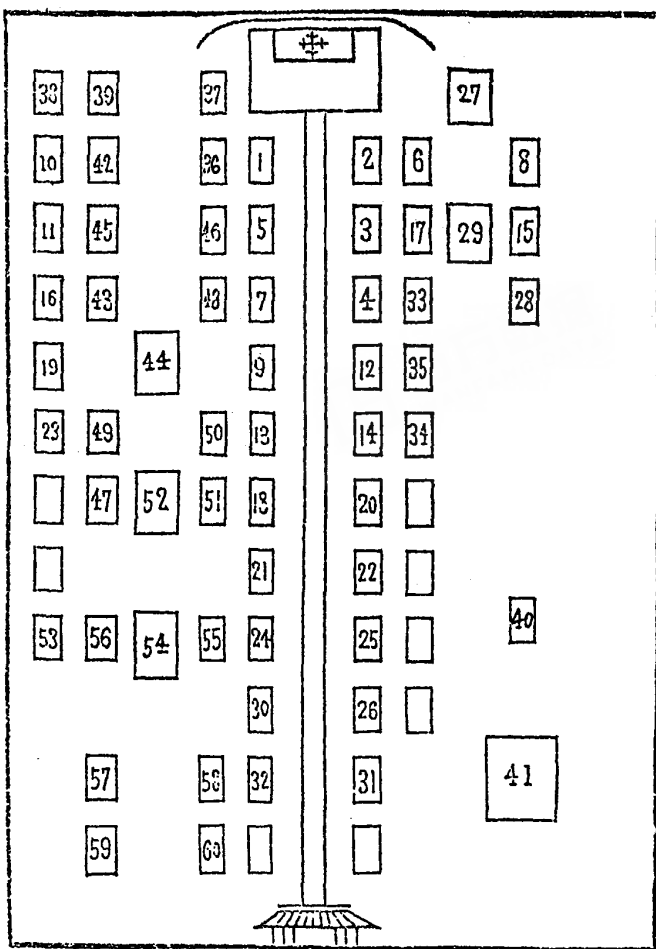


插图1：1896年正福寺墓地平面图

而整个基地的复建始于1907年。在原基地的北端新辟一区，然后将原基地上收集的残碑共67方经修复后集中在新区竖立起来。其中耶稣会士占31人，圣味增爵会士31人，其他传教会3人，另有2方没有碑文。

在墓地中，有2方非神职人员的碑值得一提。一方是“法国阵亡官兵纪念碑”，一块是法国军官墓碑，现已成为英法联军曾经入侵中国的历史见证。关于法国官兵入葬地及所立纪念碑的时间和地点，据载：1860年10月28日，孟振生主教在南堂为阵亡兵弁举行追亡祭礼。“礼毕发引，忽恭亲王差官来请孟主教面晤。顾孟主教当时未得随辎。迨晤亲王后，祝圣棺槨，殡葬如礼”<sup>⑤</sup>。从这段文字可知祭礼应是在南堂举行的，而入葬地根据会晤恭亲王后“始驰至茔地”<sup>⑥</sup>等语则应为城外的某处墓地。再根据当时正福寺墓地尚未归还给教会，这些法国官兵应该是葬入了栅栏墓地。同时在那儿建立了“法国阵亡官兵纪念碑”。待正福寺基地返还后又移至该墓地。有记载说，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法国人在内城西北角，即北堂北侧获得了一块土地，就把此处作了法国的新墓地，1860年战争死亡法国官兵纪念碑等也被移至此处。法军当局当年曾想把这些阵亡者葬在内城，遭到了恭亲王的拒绝，而这块处于北堂北面的土地

使他们实现了当初的愿望<sup>⑦</sup>。然而，笔者多次走访北京教堂及向有关人士咨询，均未得到能够支持“北堂北面曾经存在过新法国墓地”一说的证据。笔者曾见过一张1901年北堂在庚子事变后重新修复后的彩图，占地面积很大，主教堂的前后左右皆有好几进院落和大面积的空地及绿地。若在教堂后面（即教堂北侧）辟出一块地方来安置从正福寺墓地移来的纪念碑并不是不可能的，也许那只是一个小广场，或干脆就是一片稍大的空地而不是什么墓地。不过地理位置不是“内城的西北角”，而是在“皇城的西北角”。而且，把皇城的西北角和北堂北侧相提并论也似乎比内城的西北角更贴切一些。另一块是1860年张家湾战斗中阵亡的法国中士 de Bamas 的墓碑。当时的主教孟振生正是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讨还了正福寺墓地。在张家湾战斗中法国中士 de Bamas 阵亡，清政府迫于压力，允诺了法军司令官蒙哥马利要隆重为其举行葬礼，并葬入正福寺墓地，同时还要孟振生主教主持丧仪的要求。而孟却表示没有正式文书，他无法主持这次葬礼。无奈中，恭亲王被迫以钦差大臣的名义为其颁发了一份执照，上写：“大清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为给付执照事。查得西直门外正福寺旧有西洋人坟地一处，现交与法国钦差转交主教孟，管业行派人看守，并饬知地方官出示禁止附近居民不得侵毁。”发照时间是1860年11月30日。至此，正福寺墓地始交于孟振生管理。

1834年，北京最后一位葡萄牙圣味增爵会士，即北京地区主教毕学源，感到自己已年迈体衰，担心手中掌握的教会财产在他死后遭受不测，于是便将他管辖的教堂财产的文书契约“俱托俄国教士魏姓收存”<sup>⑧</sup>。1837年，随着在钦天监任职的遣使会士高守谦辞职回国，西人在钦天监出任官员的历史便从此结束了。1838年，主教毕学源逝世，道光皇帝果然降旨，要“将南堂之房屋院落一切封进入官，归内务府大臣管理”<sup>⑨</sup>。于是，毕学源生前所托之俄国魏姓教士便“向内务府追索遗业。皇上复降谕旨，令将南堂归还俄国教士魏姓收领”<sup>⑩</sup>。此外，“南堂之西洋书库，亦俱赖俄教士照管，不至荒废损失”<sup>⑪</sup>。1860年，“魏姓教士接位之人将毕学源寄托之书册，全部归还”<sup>⑫</sup>法国修士。由魏姓教士归还的“洋书六千余部”，后皆存于北堂。原“北堂之书库，卷帙亦颇富饶”<sup>⑬</sup>，为躲避道光朝的禁教风潮，“曾移于至正福寺空地托此处信友收藏。信友恐被搜查，将书成以笥篋，埋之地中。满望风波稍定，再行掘挖。不料收藏之人俱被拿获，发往新疆充军。他人不知藏处，以至全库珍藏，尽行迷失”<sup>⑭</sup>。据记载，当1835年孟振生第一次到正福寺墓地时，这里情况尚好，墓地周围有高墙围着，园内植有果树等树木400余棵，还有房屋20多间。教堂还在，只是以前神甫住的地方已经很破了，或许是长久无人居住的关系。从墓地大门至墓地深处，有一条铺设完好的小路，路的尽头竖有十字架。路的两侧有墓，排列成行，墓前有白色大理石墓碑。工科给事中苏霖等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为报访获传习天主教人犯的奏折中对当时的墓地这样写道：臣等亲往查看“见该处原系西洋人坟地，另有一院正房五间，西房三间，房内桌椅齐备，壁上张挂俱系天主教图象”<sup>⑮</sup>。据当时因信教被官方拿获的人犯文八供称，他的父亲因习天主教，1838年被发遣伊犁，“正佛寺天主教坟地内”的“房屋园地系伊父所买”。文八的五世祖既是当年因传习天主教被雍正帝严加责罚的苏努贝勒，“贝勒苏努于雍正年间因案革爵，将其子孙废为庶人，嗣于乾隆年间赏给红带子为记。文八之祖图明于嘉庆年间因习教犯案复革去本身红带子发遣伊犁。道光十八年二月间，文八之父图兴阿并伊兄文广亦均因习教革去红带子发遣”<sup>⑯</sup>。此奏折中还提到“西洋人毕学源在日经管西洋人坟地二区。一在沙拉村，一在正佛寺。地方均盖有房屋。其正佛寺地方坟屋早年即卖给文广为业，留有沙拉村坟屋经毕学源居住”<sup>⑰</sup>。从以上奏折内容我们可得知，正福寺墓地及墓地上的房屋财产等在北京地区主教毕学源健在时，便已卖予苏努

之后文广。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禁教政策日益严厉，北京的外籍传教士越来越少，毕学源实在无力照管远在海淀的正福寺墓地。以此推论，孟振生1835年在正福寺看到的应是已经归入文广名下的墓园情景。也就是说，很可能从毕学源任主教初年至1838年前后一直是苏努一族在掌管墓地。后来禁教日烈，苏努一族因笃信天主教被流放伊犁，正福寺墓地从此失去了正常的管理，逐渐荒芜了。至于墓地的所有权，也在那时以墓地的承管人文八“身系觉罗，不应私管西洋人坟地”<sup>⑩</sup>为由被官府收回了。

自1840年始，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两次鸦片战争皆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战争对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随战败而来的是软弱的中国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从政治上保证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利益，使之得以在中国合法传播，但与此同时也埋下了仇视洋人洋教的种子，人们对神甫的亲近与尊重被日益增强的仇恨淹没了。这一时期，全国教案不断，教堂和教会附属设施及传教士墓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北京教区的教务在主教毕学源去世后，一直由葡人赵若望代为管理，人称赵主教。该人返回欧洲后，北京教区便转由遣使会孟振生主教掌管。

1860年，当孟振生再次到正福寺墓地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已是一片荒芜景象。墓园的围墙已被拆至墙根，所有的建筑皆被破坏，资财已被变卖一空，甚至连一棵树都没有剩下。墓地中间甬路上铺的石头、砌墓的砖也遗失殆尽。往日神圣的十字架横卧于尘埃之中。可见当时此地已属无人管理的荒墓。由于当时经费有限，致使孟振生想重修墓园的愿望未能实现。1860年孟振生获得正福寺墓地的管理权。1861年，孟因教务返回欧洲，并于次年再次进京。回来后，便着手用拿破仑三世从中国战争赔款中拨出的银两修缮北京各处的教堂、园囿等建筑设施。如北堂、南堂、西堂及北堂附近的仁慈院等皆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此外，正福寺墓地也在此时得到了较为彻底的修缮，“阜成门外正福寺之法国茔地，久已荒废，孟主教即令重修。于是，砌墙植树，竖立颓碑。其洋式墓丘亦皆扫筑完好。一切修工，所费甚巨，然而犹不止焉”<sup>⑪</sup>。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拉丁文碑拓上关于“1863年重修正福寺墓地”的文字记载，应指的即是孟振生修整墓地完工的时间。

1860年后，天主教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表面上看似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用强权和压迫求得发展毕竟是难以长久的。因为用大炮和不平等条约来保证传教的权利，本身便是违反《圣经》教义的。当时的美国宗教界人士WA 梅西先生便对西方的强盗行径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他说：“战争和暴力只会导致罪恶，炮声述说的绝不是兄弟般的情谊，而是仇恨和邪恶。”<sup>⑫</sup>“这个民族可能会被挫败，但是火与剑是不能使他们对西方产生爱的。”<sup>⑬</sup>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此。从1840年至1900年，全国发生教案400余起，且大多集中在19世纪后30年。在1900年震惊世界的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中，教堂、传教士墓地也同样遭到洗劫。在此期间，正福寺墓地的教堂被捣毁。后来，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软弱的中国清政府与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西班牙、荷兰等11个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根据条约第四款，教堂、墓地归还给了教会。因此，正福寺大堂及院中的房屋于1903年得以重建。墓地的全面复建应在1907年。本文收入的1917年绘制的正福寺墓地平面图大致显示了改建后的新格局（见插图2）。首先，是把原来墓地上被毁的残碑经修复后集中排列在墓地的北端（即平面图中字母A所在之处）。原来神甫的3处住房以虚线描出，可见这几处住所没有能在1907年重建。虚线C所标的地方是原来法国纪念碑所在位置，目前，这块碑现在也已不知去向。



从图中还可看到墓地南半部靠东南有一独立院落，院子北部标有字母G的地方原来建有小教堂一座。后在1907年的墓地修建中被改为住所。同时在院落中心偏东处新建圣堂一座。新堂坐北朝南，宽约七、八米，长约十七、八米，规模较原来的墓地教堂要高大宽敞得多。这座新堂是为社会上的信教人士修建的。通过现存的解放初期的墓地平面图可看出，经过这次整修复建后，其格局基本保持到解放前后。只是在1917年图中所标注的3处神甫住房在后来的图中已经成了土堆。

解放后，全国政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纲领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根据中央政府关于要提高民族自觉性、坚决肃清帝国主义影响，恢复宗教团体本来面目之精神，教会驱逐了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外国神父，宗教活动逐渐走上了正轨。正福寺墓地也基本保持原样。据当时生活在周围的人回忆，当时教堂及墓地周围皆住着村民，可看到神甫们自己种菜，打理田园果木。墓地虽然已荒芜，但教堂还在。1958年后，正福寺墓地的教堂变成了正福寺生产队的仓库，墓地也无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正福寺墓地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教堂被拆除，院内建筑被毁。至此，具有160余年历史的正福寺墓地基本上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至于那些墓碑，在“文革”中，被用作了建筑防空洞的材料，幸被北京有关文物部门得知后设法保护了起来。现存墓碑共计36块。而其他著名的墓碑如耶稣会士宋君荣（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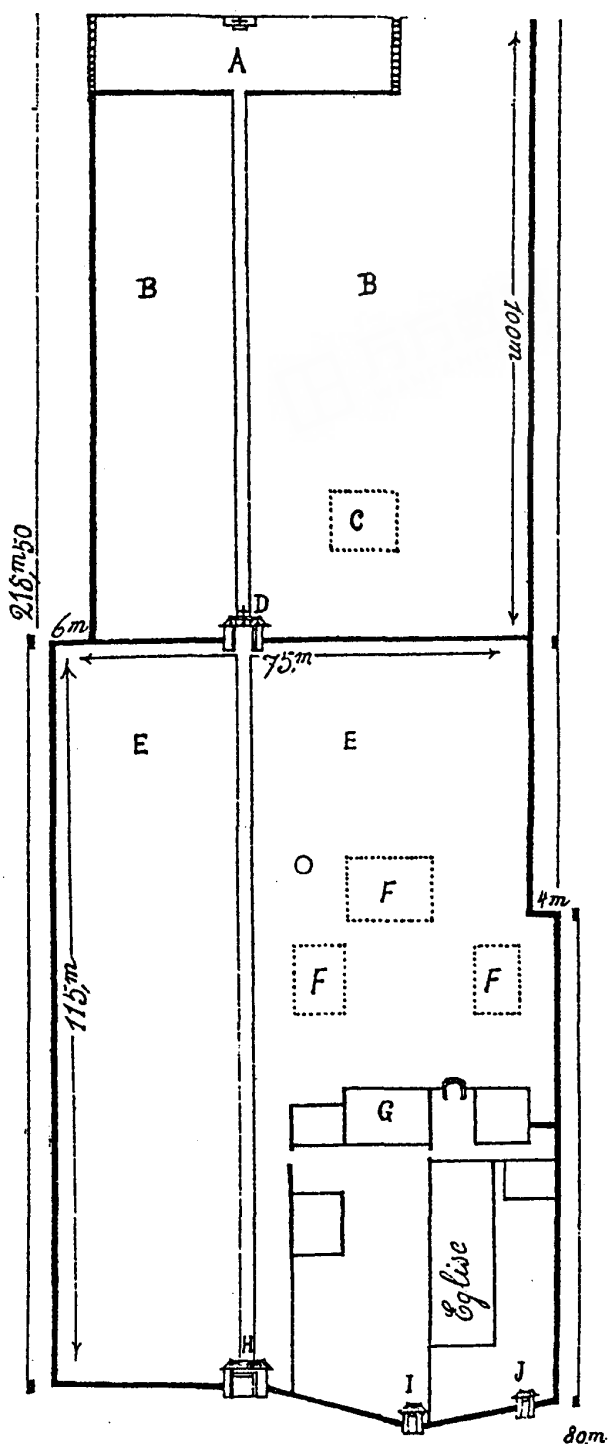


插图2：改建后的正福寺墓地平面图（1917年绘）

于1759年)；严守志(卒于1770年)；李俊贤(卒于1774年)；巴新(卒于1774年)；金济时(卒于1781年)等40余块墓碑则不知去向。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建立时，这36块墓碑又在真觉寺院内即今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重新竖立起来，其中有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巴多明等人。

2003年夏初，笔者曾寻访正福寺墓地旧址，发现除墓地原址上的西城区酱菜厂、金百瀚会馆等单位及正福寺小学外，周围已是一片瓦砾，彰化村已被全部拆除。走近现曙光变压器厂的大门，这里原是墓地南端的圣堂所在地，院子的东面有2间高大的拱顶建筑，据说这里便是正福寺墓地圣堂的原址。一侧紧挨着原来的院墙，院墙已十分破旧，墙脊上长满了茅草。院内靠北墙是一排平房，其中有5间是原来的老屋，老屋的前面又接出来一块。屋顶上有铁架竖起，上写“北京曙光服装设备厂”。那5间老屋为深灰色的瓦顶，深灰色的砖墙，带着历史的厚重感，一看便知是很老的居舍了。和残存的围墙一样，灰色的瓦脊上也长着细细的茅草，或许，时过境迁，人物皆非，不变的唯有这纤纤细草吧。在一间房子的檐下，看到一块石碑，只剩下大半，“天主堂”3字依然可辨，唯堂字下半部有所缺损，石碑是在前不久，被人凿断运到那里的，后来就一直横卧在檐下。听当地的老人讲，这块残碑原为址界碑，在墓地的四至各角各竖有一块，最后只剩下东南的这一块，现在，这最后一块也被拔除了。据说，彰化村拆迁后将建设绿地，而在墓地原址上将复建正福寺教堂。

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远渡重洋，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而在当时的欧洲天主教诸修会中，耶稣会的传教士是最富有学识的，其中很多人是当时欧洲著名的学者，如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皆是“灵采研究院”(今“教廷研究院”的前身)的院士，白晋等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他们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出版了大量介绍西方科技与中国思想文化的书籍。较早回到欧洲的罗明坚，不仅带回很多中国图书，还出版了他翻译的《利玛窦传记》，在欧洲大受欢迎；卫匡国曾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的书。孔孟学说及在明清之际备受推崇的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著作皆是通过传教士传到西方的。为西方了解中国起了很大作用。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在与翰林院学士审慎考虑之后”，耶稣会士用汉文写成的《天主实义》(利玛窦著)、《轻世金书》(阳玛诺著)、《教要序论》(南怀仁著)以及《七克》(庞迪我著)等4部阐述天主教教理的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此外，在天文、地理、地质、化学、医药、艺术、音乐、绘画、印刷、翻译等方面传教士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据葬入北京墓地的外籍传教士的有关资料统计，从利玛窦进京谒见明神宗，至最后一位在宫中供职的毕学源去世，前后曾共有80人左右服务于宫廷。其中职位最高的是汤若望，曾领“光禄大夫”衔，“头戴红顶，身着鹤补官服，官及一品大员”<sup>②</sup>。由传教士白乃心于1660年画的汤若望身着鹤补官服的画像，至今仍挂在罗马的耶稣会驻地，无声地向人们昭示着传教士在中国宫廷内曾经拥有过的辉煌。这些在京居住或供职宫廷的传教士在去世后大部分葬在了北京。北京明清传教士墓地，无论是墓穴的布局设计，墓碑的纹饰，还是陵园内的建筑风格，均体现出中西文化融合的特点。这样的历史文化载体，应受到世人的保护。而对墓地的考证及相关历史的追索，无疑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史料》一卷(康熙时驻苏州时致西洋人谕)，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页。

②《清世宗实录》卷25。

- ③⑤⑧⑨〔法〕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下篇,第71、30、30、35页。  
 ④*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ekin*(《北京教会史》法文版),第340页。  
 ⑦〔日〕矢泽利彦《北京四大天主堂物语》(日文版),第327页。  
 ⑧⑩⑪〔法〕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下篇,第20页。  
 ⑪⑫⑬⑭〔法〕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下篇,第21页。  
 ⑮⑯一史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三卷《巡视西城工科给事中萨霖等奏报访获传习天主教人犯并经卷图像请交部讯办折》,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66、1268页。  
 ⑰⑱一史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三卷《定郡王载铨等奏报会同申明官役查拿传习天主教人犯尚无藉端滋扰情形折》,第1277、1277页。  
 ⑳㉑《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第72页。  
 ㉒George H. Dunne(邓恩)*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一代巨人: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美国印第安纳州Note Dame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49页。

(作者王和平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室馆员 邮编100009)

(责任编辑 王 激)

\*\*\*\*\*

(上接第60页)

- ①弘治《两淮运司志》卷五。  
 ②清《续文献通考》卷二〇《征榷三》。  
 ③宣统《山东通志》卷八六《田赋·盐法》。  
 ④⑤〔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二八、卷二九。  
 ⑥⑦⑧《明会典》卷三二《盐法一》。  
 ⑨〔明〕朱廷立《盐政志》卷七。  
 ⑩⑪嘉靖《钦州志》卷三。  
 ⑫⑬雍正《长芦盐法志》卷二、卷一一。  
 ⑭〔明〕周昌晋《福建建正全书》卷下《盐疏》。  
 ⑮嘉靖《惠安县志》卷七《课程》。  
 ⑯⑰〔明〕郑晓《今言类编》卷二《经国门·盐法》。  
 ⑱〔明〕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三九《盐法》。  
 ⑲乾隆《绍兴府志》卷一三《盐法》。  
 ⑳㉑〔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四、卷二五。  
 ㉒〔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五《盐法前》。  
 ㉓嘉靖《河间府志》卷八。  
 ㉔〔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  
 ㉕⑹〔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一四六、卷三七五。  
 ㉗〔明〕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卷五《盐策》。  
 ㉘〔明〕汪砢玉《古今镜略》卷六《利弊》。  
 ㉙万历《通州志》卷四《贡赋》。  
 ㉚雍正《新修山东盐法志·援证三》。  
 ㉛〔明〕章懋《枫山集》卷一。  
 ㉜〔明〕袁世振《两淮盐政疏理成编》卷四。

(作者李珂 中国档案出版社副编审 邮编100032)

(责任编辑 王 激)



# 明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北京墓地考略(下)

作者: [王和平](#)  
作者单位: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室馆员, 100009](#)  
刊名: [历史档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HISTORICAL ARCHIVES](#)  
年, 卷(期): 2004, "" (3)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1条)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史料》一 2003
2. [清世宗实录](#)
3. [樊国梁](#) <燕京开教略>下篇
4.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ekin](#)
5. [矢泽利彦](#) [北京四大天主堂物语](#)
6. [樊国梁](#) <燕京开教略>下篇
7. <燕京开教略>下篇
8. [一史馆](#)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三 2003
9. [一史馆](#)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
10.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11. [邓恩](#) [Generation ofGiants: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一代巨人:晚明入华耶稣会士\)](#) 1962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stda200403008.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stda200403008.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40d9cf6d-e4b1-48e5-ba81-9e4d007fd0bf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